

朱莉亚·克丽丝特娃
(北京-上海演讲)

《一个欧洲女人在中国》

我很高兴今天能够与中国热情的听众见面。三十五年前，也就是 1974 年五月，我与菲利普·索莱斯和其他被我们的邀请方称为“《求是》杂志的同志们”的几个朋友（罗兰·巴特、弗朗索瓦·瓦尔和马瑟兰·普莱奈）一道，首次访问了中国。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是新中国加入了联合国之后接待的第一个西方知识分子代表团。

与当时人们所说的相反，我们的那次访问并非对当时占主宰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完全支持。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而且对我的那些朋友们来说也应当是，只是各人情况有所不同而已。当时的我，对中国文明充满了好奇，同时对在那里发生的政治变革也抱有同样的好奇。而且，我当时在巴黎七大已经注册了四年中文。今天这所大学依然是我任教的地方。我带着激情阅读了李约瑟的《中国的科技与文明》。我非常好奇地看到，我找到了（至少）两个答案，回答了我下面要说的的问题，而且这问题直到今天还具有现实意义：

一，如果说中国式的共产主义与西方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有所不同，那么，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传统是如何帮助形成了这一谜一般的“中国式道路”？

二，中国传统的一些概念，如因果、神圣、阴阳、语言与文字，是否使得中国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人文主观性”，与在西方古希腊、犹太-基督教传统中所形成的不同。假如是的话，这些主观的经验又如何能够与我们普遍而又多元的人类的其他文明相遇、相对立或共存。

你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些问题，对于一个三十出头的女子来说，既能掀起激情，又是无法找到解决办法的。然而，我当时所见到的中国现实，主要还是文革时期，女子与青年都受到共产党的号召而去打破旧体制，这尤其吸引了我，因为我关注当今妇女从过去中得到解放的问题。所以在我回国之后，我写了一本关于中国女性的书，是献给中国女性的。顺便可以提到，这本书在下个月就可以出中文的译本。然而，同时，顽固成形的苏联模式与官方僵化的话语根本不顾及个体与集体的思想的自由发挥，这使得我的调查几乎无法深入，甚至让我陷入绝望：以至于我后来放弃了我已经开始走上的汉学研究道路。

回到巴黎以后，我主要专攻符号学与精神分析，还生了孩子。但我并没有忘记我上面所提到的问题。这是一些非常大的问题。十七、十八世纪的耶稣会士们已经在天主教的普世主义所允许的范围内、以他们的方式提出了这些问题，而接下来的人文科学和汉学则以一种技术性的、细致的方式继续了这方面的探索，这种充满技术性的细致入微的探索，直到现在还依然让我着迷。

从我的首次来访到现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变。这次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在接待我。到处是摩天大楼，取代了原先风俗很浓的小巷中的简陋房子和苏联式的规矩楼房。我见到的已经不再是身着蓝色制服的、凝结着共同能量的群众，而是一批批多姿多彩、充满干事精神、对全球化的世界进行挑战甚至让世界害怕的人群。如果说，我的那些问题继续存在，

